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出版合作实践机制：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

李 意 郑兆辰

摘 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出版合作是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点领域,承担着实现文化资源双向整合与价值共创的重任。双方通过政府主导与市场联动、数字化技术赋能、跨文化策略优化等多重路径协同推进,取得了诸多显著成果。本文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转译”模型,采用动能生成、网络强化所涉及的“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四阶段机制分析中阿出版合作的具体实践。研究发现,中阿出版合作在推动双方文明知识共享、丰富国际文化交流内涵以及提升全球话语权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现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与此同时,出版选题与市场需求脱节、出版数字化转型受到制约以及文化理解不足和语言差异等问题依然存在,双方应重视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推动数字出版平台的共建,构建稳定高效的创作网络,进而实现中阿出版合作在内容和机制上的双向提升。

关 键 词：文明交流互鉴;实践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中阿出版合作

作者简介：李意,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编审(上海 200083);郑兆辰,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 2024 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162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4-0030-2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文明发展趋势研究”(22JJD810032)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国际出版合作是不同文明藉以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它通过跨国文化合作实现知识的传播和共享,堪称文明交流互鉴的“毛细血管”。相较于影视、艺术等媒介,作为文化“软载体”的出版物通过系统性知识传递与深度意义阐释,能够突破文化符号的浅层表达,实现价值共识的“厚传播”(thick communication)。^①近年来,中阿出版合作势头强劲。在中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中,出版合作之所以成为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主要源于其独特的文化中介功能与跨文明对话效能,它既能体现双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求,又可以推动中阿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相较于能源、基建等物质领域的合作,出版合作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低政治敏感性与价值观传播的渗透力,构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桥梁”。这种合作模式既规避了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的可能冲突,又以知识共享的方式促进了中阿双方对彼此文明内核的理解。通过文本互译与思想对话,中阿出版合作超越了单一的文化展示并升级到文明共生的话语建构平台与价值传播网络,为深化中阿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提供了文化认同基础。其内在机制亟待理论解构与实践深化。

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领域,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阿文明交流的价值阐释、历史经验的梳理以及理论构建上,为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交流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和理论支撑。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推动全球治理,这些文献在探讨理论内涵的同时,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在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方面的重大作用。^② 相关研究对于理解中阿文明互鉴的启发性意义较大,但对一个动态化、可操作的协同机制的产生及发展仍显关注不足。在中阿出版合作领域,既有研

① 这一术语发展自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概念。它是对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方法论,核心观点包括超越表象、语境嵌入以及对于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的阐释。“厚传播”指的是通过系统性内容生产、交换与深度意义阐释,实现文化价值的语境化传递与共识性理解。

② 参见丁俊、李清扬:《中阿文明交流:历史机理、现实关切与前景展望》,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5年第1期,第3-31页;韩建伟、丁俊:《现代化视阈下中阿文明互鉴的理路与进路》,载《西亚非洲》2024年第6期,第3-29页;陈越洋:《文明交流互鉴在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载《国际观察》2024年第5期,第19-43页;孙德刚:《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机制构建与发展前景》,载《当代世界》2023年第1期,第46-52页。

究多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阿出版合作交流的现状、成果与发展进路进行阐述^①,或是在文明交流互鉴视阈下对中阿文化产业的合作案例进行阐释^②,但对于文明交流互鉴从理念到落地的转化路径,尤其是政策工具、市场动力的联动逻辑,如何指导中阿出版合作实践、对接政策需求等关键命题,仍有探索空间。

任何文明交流实践必然产生可观测的效应。这些效应既包含显性的物质成果,如技术扩散^③、制度学习^④等,也蕴含隐性的认知互构,如价值交流、思维变革等。^⑤ 文明交流互鉴实践作为机制,始终指向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成果共享及重构价值共识等诉求。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实践过程,其机制性不仅体现在预设目标的设定,更在于通过具体行动将抽象目标转化为可观测的影响。机制性阐释有助于通过拆解特定文明交流互鉴实践的过程,解析其相互作用的因果链条或者发展进路。文明交流互鉴实践机制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系统过程,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间的互动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需要构建一套适应多元主体协作的实践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 理论”)中的“转译”(translation)模型强调特定社会进程的过程性特征,这种过程有助于理解国际规范如何在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传播和被接受。鉴于其注重多元主体在协作中的动态调适与协同进化,“转译”模型被视为文明交流互鉴具体实践的解释工具。^⑥ 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其核心在于通过协商与

① 参见黄慧、陆必纯:《中阿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合作的机制、成效与挑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3-18 页;张捷、涂晓韦:《“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阿拉伯国家出版交流合作探析》,载《新闻爱好者》2023 年第 6 期,第 110-112 页;杨雪:《“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出版交流与合作》,载《出版广角》2023 年第 24 期,第 10-14 页;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1 期,第 140-160 页;李睿恒、马晓颖:《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图书出版的传播力探析》,载《对外传播》2017 年第 5 期,第 60-62 页。

② 参见唐家梅、王远:《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阿数字文化产业合作特点与进路》,载《对外传播》2023 年第 8 期,第 37-40 页;荆孝敏:《图书搭建桥梁,文化通向心路——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对外合作与推广》,载《出版参考》2019 年第 9 期,第 14-16 页;高彬:《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在阿语国家的译介研究》,载《中国翻译》2022 年第 1 期,第 47-55 页。

③ Thomas Kingston Derry and Trevor Illtyd Williams, *A Short History of Technolog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 D. 1900*,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0.

④ 刘景华:《文明四论:本体、比较、互动、互鉴》,载《天津社会科学》2024 年第 1 期,第 139-146 页。

⑤ 高福进、孙冲亚:《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论”的主要意涵及其构建路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9 期,第 86-89 页。

⑥ 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参见 Daniel Nexon and Vincent Pouliot, “‘Things of Networks’: Situating A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7, No. 3, 2013, pp. 342-345.

互动,将异质行动者的利益、目标和问题转化为共同行动的过程,从而实现网络的联结与稳定。卡龙将“转译”过程分为“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 (interessement)”“征召 (enrollment)”“动员” (mobilization)”四个阶段。^① 行动者之间通过互动、冲突或合作,重新定义问题、调整目标并形成共同行动框架(见图1)。本文将“转译”模型归纳为“动能产生”和“网络强化”两个总阶段,通过分析中阿出版合作的构建逻辑和可持续运作机制,针对当前合作网络中反映出的关键问题和节点,提出加强中阿出版合作的优化路径,旨在凸显中阿出版合作对于两大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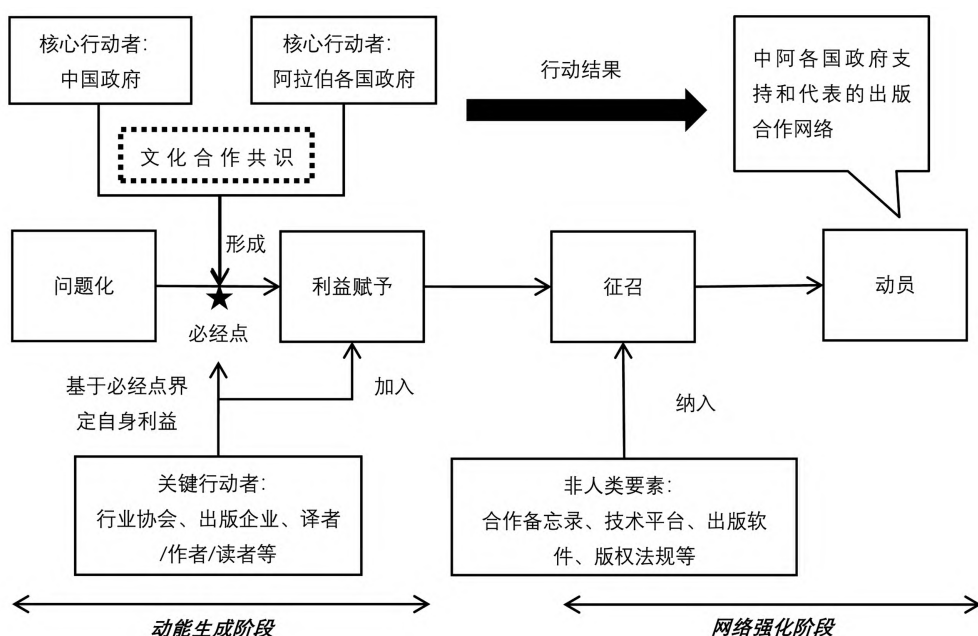


图1 “转译”模型视域下中阿出版合作的实践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模型自制。

一、中阿出版合作的动能生成

出版合作的“动能生成”过程可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子阶段。第一阶段是“问题化”,旨在识别并提出合作中各方所面临的核心议题;通过聚焦中阿在现实

^① Michel Callon,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ohn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pp. 196–233.

需求、文化理解、价值观差异、传播渠道与机制等方面的需求与挑战,明确主要行动者及其角色,将多元需求凝聚为可协同运作的“问题框架”。第二阶段是“利益赋予”,通过利益联结与共识塑造,将前期识别的问题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借助合作协议、示范性出版项目与多边机制,各方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共同推动版权合作、翻译出版、发行渠道拓展及文化品牌建设,从而在动态互动中持续释放多元主体^①协作的动力。

(一)“问题化”:中阿出版合作的差异识别

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中阿出版合作实践的第一阶段围绕“问题化”展开。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框架下,“问题化”是转译过程的第一步,它涉及三个要点:首先,需要明确识别特定问题或挑战;其次,需要确定哪些行动者能够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角色;最后,需要理解每个行动者的角色和期望,核心行动者提出共同问题,并定义“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要求其他行动者必须通过该点才能实现自身目标,从而能够将其有效纳入到合作网络当中。^② 其本质是通过不同行为者的动态协商,将分散的、异质的需求与矛盾转化为可共同协商与操作的“问题框架”。

1.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问题识别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往既是对自我文明的自觉性反思,也有对他者文明的自觉性借鉴^③,既与世界格局互联互通,也有相互交往的内在需求,双方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典范。^④ 21 世纪以来,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加速发展,中阿文明交流互鉴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反映在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及双方对于彼此的认知和理解依然存在不足等方面。2001 年“9·11”事件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下的全球信息传播矩阵为塑造自身发动反恐战争的合法性,对中东伊斯兰文明进行刻板印象塑造和污名化,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进行误导性关联,极大影响了包

^① 国际出版合作的多元主体是在内容创作和流通中的众多行动者,包括人类(如作者、编辑、设计师、出版商、读者等)和非人类(如技术平台、出版软件、版权法规等)。参见 Daniel Nexon and Vincent Pouliot, “‘Things of Networks’: Situating A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42。

^② Michel Callon,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pp. 205–206。

^③ 自觉性反思和自觉性借鉴强调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反思自身,借鉴他人经验,以实现更好的发展和创新。参见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载《读书》1998 年第 11 期,第 3–9 页。

^④ 蒋真:《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往的历史图景》,载《光明日报》2024 年 4 月 15 日,第 14 版。

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于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文明的概念认知,对中阿人文交流产生负面效应。^①同时,美国长期通过多种手段向阿拉伯国家推广西方价值观,采取干涉内政的方式,试图改造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反感和抵触。这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为中阿关系演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从阿方角度看,21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倾向日益明显。在文明交流方面,阿拉伯国家希望在文化和新闻等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在了解和借鉴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能抵制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妖魔化的宣传。在社会发展方面,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高速发展赞叹不已,强烈希望了解和借鉴中国在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②从中方角度看,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文化传播和传媒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文化产业要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鼓励文化产品出口,扩大文化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等。出版物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出版“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也是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必然选择。通过出版“走出去”并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理解与合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1世纪初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交往和贸易额日益增长,但双方文化交流的数量和质量与之并不匹配。从文化差异层面看,阿拉伯国家长期受西方话语体系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影响,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价值理念和传统文化传统缺乏系统性认知,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其认知普遍呈现碎片化与表层化现象,大多数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廉价产品制造国”或“政治经济大国”标签之上,缺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度与当代活力的全面了解。尽管中国文化对于阿拉伯文化而言,无论是古代造纸术的传播、丝绸之路的交流,还是当下“一带一路”倡议、文化互鉴与融合,均发挥着重要影响,但阿拉伯世界依然对把中国当作一个陌生的他者,对于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华文明的意愿相对淡薄。相应地,中国对于阿拉伯文明持高度尊重和赞赏的态度,通过开设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派出驻阿留学生、译介阿拉伯文学经典以及开设阿拉伯语广播电视频道等方式去了解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化产品翻译与传播工作尽管有部分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学、哲学著作方面,对于新的文化产品的译介仍显滞

^① Fuchang Yang, “China-Arab Relations in the 60 Years’ Evolutio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4, No. 1, 2010, pp. 7-8.

^②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第8页。

后,难以涵括其文化体量与学术价值,也难以支撑双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度和广度。^①与此同时,大量对于中国的知识来自于西方中介,进一步强化了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偏差。^②整体来看,这一时期中阿文明成果的译介和传播十分有限,传播范围也较为狭窄。

2. 中阿出版合作的意愿触发

阿拉伯国家亟待与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进行接触,开拓自身文明交流互动的方向,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同样具备与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开展合作和接触的意愿。在此之前,双方已经在能源、经贸、外交等领域具备了扎实的合作基础,能源安全需要、经贸互补需求以及国际政治中立立场的协调与相互支持,积累了一定的信任资本,奠定了后续合作的基础。双方借助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和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其他领域合作向纵深发展。2003 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提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随着 2006 年《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和 2011 年《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其目标是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传媒集团和物流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版权交易平台。支持有能力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通过多种方式在境外兴办新闻出版实体,拓展新闻出版业务。^③中国出版界通过组建国际出版编辑部或建立海外分支机构,积极拓展外向型平台和渠道,大力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合作。

在识别双方认知差异的过程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通过多维度的互动逐渐厘清了合作的互补性与必要性。这也促使阿拉伯国家和社会日益认识到加强与文化交流、增进对华了解的必要性。在这一背景下,双方政府牵头的出版合作成为弥合差异的桥梁。阿拉伯国家希望通过翻译引进中国文学、政治、经济、科技类著作,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方面则注重通过文学、哲学典籍互译展现中华文明内核,同时借助阿拉伯语出版网络拓展文化辐射力和国际影响力。意愿触发后双方进入合作前的充分沟通与调研,通过目标受众认知调研精准把握市场脉搏,中阿双方努力满足目标受众的期望,减少因认知

① 沈翊清:《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与接受倾向》,载《中国比较文学》2024 年第 3 期,第 158-162 页。

② 《文化视角下的阿拉伯与中国:需要复兴的共同遗产》(阿拉伯文),*Al Khleej*, 2010 年 1 月 8 日, <https://www.alkhaleej.ae/ملحق/العرب-والصين-من-منظور-ثقافي>, 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6 日。

③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1 年 4 月 20 日,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987387.htm,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15 日。

差异导致的市场不适应问题。

（二）“利益赋予”：中阿出版合作的需求对接

中阿出版合作实践机制的第二阶段围绕“利益赋予”展开。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利益联结和共识形成,将不同行动者的目标纳入统一的协作网络,旨在构建合作过程中的协作与交流机制。在这一阶段,双方需要形成对于深化合作的共识,并将可能的合作伙伴纳入到这一框架下,通过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等来进一步锚定合作的未来前景,吸引更多的合作方加入。

1. 中阿出版合作的共识塑造

不同文明背景的行动者对“互鉴”的价值认知和实践手段存在根本差异,这需要长期的认知调适和共识形成。一方面,加入合作网络意味着各方都有参与合作的意愿,采取渐进策略有助于规避可能的矛盾争议,即通过优先选择争议较小的领域建立示范性项目,有效协作积累信任资本。出版合作就是一个典型的示范性实践。相较于政治、经济等领域,书籍作为知识传播的媒介,具有“去敏感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基于知识共享的文明交流在保留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可以携手其他文明创造共同的价值空间。同时,可以叠加市场逻辑驱动,通过文化资本的介入不断将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的合作动能。在成功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后,行动者逐步将其信任资本和经验基础扩大到其他领域,如教育交流、学术交流等,形成文明交流互鉴实践的溢出效应。

从共识塑造来看,合作双方需要通过深入沟通,明确出版合作的主要目的。这一过程的塑造主要体现在落实中阿在该领域的一系列合作文件中。2004年,中阿双方宣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在肯定中阿关系发展历程与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中阿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共识。并为未来发展设定了方向。在同年的中阿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制定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针对中阿合作中的诸多问题领域制定了行动纲要。文件指出,中阿双方“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愿意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文化合作,共同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以及加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了解与交流,推动双方文化产业的发展。”^①中阿合作论坛搭建了一个灵活、广泛、包容的平台,有效推动了双方未来各领域的合作。2005年,首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提出“鼓励双方私有部门成立中阿联合出版、翻译和发行机构”“鼓励为双方翻译人员提供奖学金或考察机会,使他们能及时

^①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中阿合作论坛,2004年9月14日,http://www.chinaarabcf.org/lthyjwx/bzjhywj/dijbzjhy/201110/t20111011_6837004.htm,上网时间:2025年2月24日。

了解翻译动态”“鼓励有关部门培养文学和思想等领域的专业翻译,并创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措施。^① 自此,双方业已达成推动双边出版合作的共识,确认了基本方向和内容,后续工作均是围绕该时期奠定的合作主基调和未来发展大方向而展开。

在合作目标确定后,中阿出版合作模式的沟通机制、利益分配、决策流程等被提上日程。如何拓宽出版合作领域,让文化精品通过出版合作走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成为重要课题。阿拉伯国家希望通过建立全流程保障系统,进一步完善中阿出版合作机制。双方以加强中阿互译出版和参展工作为主要目标,积极培育出版交流合作的重点企业,优化合作环境与政策扶持力度,努力提升中阿出版交流合作的水平。2015 年 9 月,阿拉伯出版商协会 (Arab Publishers' Association)^② 驻中国办事处正式落户中国宁夏银川,为共同塑造多元化的合作模式提供支持,具体工作包括互译出版、版权交易、书展合作、数字出版合作、学术出版合作、本土化建设与渠道拓展等。

2. 中阿出版合作的落实引领

在明确问题与确定合作意愿的基础上,中阿双方通过以政府为核心的顶层引领,引导深化人文交流的共识塑造。中阿双方均同意,基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等基本原则,促进对话交流、文明互鉴。在此基础上,双方高度重视出版合作顶层设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协调统一的出版体系。2010 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签署了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合作备忘录,成为“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开展的重要文化合作项目之一。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了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典籍、现当代文学作品、少儿作品的互译工作。项目第一阶段目标为双方各 25 种图书,在五年内完成。^③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国际出版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2014 年,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翻译出版优秀作品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立项,加快推动了中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在丝路国家的出版发

① 《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总结报告〉》,中阿合作论坛,2011 年 10 月 12 日, http://www.chinaarabcf.org/lthyjwx/wmdhyth/201110/t20111012_6836390.htm, 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20 日。

② 阿拉伯出版商协会成立于 1995 年,由 22 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 1,242 家出版商组成,总部设在埃及开罗。参见 Arab Publishers Association, https://www.arab-pa.org/En/Shared/GP_Details.aspx?GP_ID=1612,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③ 《中国与阿盟签署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合作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0 年 5 月 13 日, https://www.gov.cn/gzdt//2010-05/13/content_1605561.htm, 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5 日。

行。当年,工程重点推动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斯里兰卡、摩洛哥等六个国家建立经典作品和优秀图书的互译机制。^① 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中阿双方在宁夏银川相继举办了三次出版合作论坛,讨论了版权作品交换、出版和发行合作、文化交流和书籍交换等问题,进一步拓展了双方在出版方面的合作渠道。^② 在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图书馆与信息领域专家会议等机制的引导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图书馆2014北京合作倡议》《中国国家图书馆与阿拉伯联盟秘书处谅解备忘录》等协议相继签署,中阿出版交流与合作步入新台阶。

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鼓励双方新闻出版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积极落实《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合作备忘录》,鼓励和支持各自出版机构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国际书展”^③。中阿双方新闻出版机构进一步开展交流与合作,包括定期互访、业务交流、人员培训等。2017年,中国文化部公布《“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建设计划,强调以政府主导、市场引导为原则,通过组织协调、专项资金、重点项目库、重点人才培育等方式支持出版合作。^④ 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出版合作交流的常态化、机制化建设。以中宣部确定的重点外宣企业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为例,截至2023年,其在中阿图书出版和版权贸易领域成果丰硕:在图书翻译与出版方面,智慧宫已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出版了10多个语种的图书1,600余种,包括“读懂中国系列”“认识中国系列”等70余种主题类图书;在版权输出方面,智慧宫已促成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图书出版及版权贸易领域的多个合作,输出中阿文图书1,400多种。^⑤ 阿拉伯国家也积极推动双方出版合作框架协议落地落实,积极与中国签署出版合作协议、开发数字平台建设等。正如阿拉伯出版商协会主席穆罕默德·拉沙德(Mohamed Rashad)表述的那样,中阿出版合作不仅有助于文化交流,还能推动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为构

①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中国“一带一路”网,2016年11月11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2462.html>,上网时间:2025年5月7日。

② 黄慧:《中阿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合作的机制、成效与挑战》,第10页。

③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6年1月13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fxgk_674865/gknrlb/tywj/zcwj/201601/t20160113_7949944.shtml,上网时间:2025年2月25日。

④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1703/201703010312012.pdf>,上网时间:2025年5月7日。

⑤ 李卫东、姜盼:《宁夏智慧宫把中文教育“种”进22个阿拉伯国家》,载《宁夏日报》2024年12月30日,第1版。

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厚植人文根基。^① 通过出版合作,双方共同传播两大文明中积极的价值观,进而凝聚起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二、中阿出版合作的网络强化

网络强化阶段标志着异质行动者从松散联结转向制度化协作,其核心是通过“征召”和“动员”吸引更多成员加入,并进入稳定的网络结构与运行秩序。由于不同行动者的自主性可能导致网络的不稳定,即使各方达成初步共识,行动者依然可能因为自身或者外部动因脱离协作网络。因此,增强网络黏性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增强合作行为的“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非人类行动者(技术、物质、制度、文化等)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阿出版合作中,双方通过共建基础设施、项目长期投资等方式,增加行动者退出网络的沉没成本;抑或是通过符号性承诺(签署多边宣言、合作协议等),增加行动者退出网络的声誉成本,扩大其背离合作共识的风险。通过资源、规则等方面的约束,行动者可以将其自主性转化为巩固网络的动力,进而为维护既有投入主动优化合作能力。

(一)“征召”:中阿出版合作主体的多元化

中阿出版合作实践机制的第三阶段围绕“征召”展开。在这一阶段,双方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项目扶持、行业协同、书展平台支持等方面。作为最主要的行动者,中阿双方政府加大出版项目扶持力度,通过政策优惠和扶持吸引更多相关方加入到合作网络中,在合作网络强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中阿出版机构发挥协同作用,为进一步巩固合作网络提供强力支撑。

1. 中阿出版合作的协作努力

在政策支持方面,中国由中宣部、外交部、文旅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外文局等官方部门扮演主导角色;阿方由阿拉伯出版商协会以及各阿拉伯国家相对应的出版职能部门牵头开展工作。同时,双方出版机构(商)积极配合,中方包括中国外文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中华书局等;阿拉伯方包括埃及萨玛出版社(Sama Publishing)、黎巴嫩阿斯拉出版社(Asala Publishers)、沙特阿尔·瓦塔尼亚出版集团(Al Watania Distribution)和阿联酋卡利马特集团(Kalimat Group)、摩洛哥阿尔巴尼出版社(Al Albani Publishing)、卡塔尔大学出版社(Qatar University Press)、阿尔及利亚卡斯巴出版社(Dar Al-Qasbah)等出版商。这些出版机构在内容策划与选题开发、版权管理

^① 王海洲:《中阿出版合作交流论坛在沙特举办》,新华网,2023 年 10 月 2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3-10/02/c_1129897174.htm,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5 日。

与授权合作、渠道拓展与市场推广、多方协调与资源整合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项目扶持方面,随着 2016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中国政府不断激励扶持出版走出去,现已取得瞩目成就。相关项目包括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①、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项目、中阿友好文库项目、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人民天舟摩洛哥分公司——灯塔出版社项目^②、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阿拉伯国家通过支持本国出版机构参与中阿出版合作项目,也在努力推动中阿出版合作的深入发展。在双方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出版项目凝聚起政府、出版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方力量,奠定了选题策划、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等方面全领域覆盖、全要素整合、全流程优化的格局,顺利完成了合作倡议和谅解备忘录所设置的预期目标。

在行业协同方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出版合作不仅依托政府在政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加持,同时也需要出版社和出版人底层创新驱动。通过图书出版发行、组织文化交流等活动,业内开展合作为中阿出版交流注入了强劲动能。2015 年 8 月,中国出版集团与阿拉伯出版商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次与 20 多个阿拉伯国家的 900 多家出版社开展大规模合作,开始尝试构建出版社之间的合作机制及定期互访机制。2017 年 4 月,在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期间,北京扎耶德中心文库正式启动,涵盖“中国经典阿拉伯语译丛”“现当代名家名作系列”“文明交流互鉴丛书”三个系列,截至 2023 年出版图书 80 余种。这些成果和内容的落地,维护了双方继续加强投入并提升合作水平的意愿。

在书展平台支持方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辟多种渠道推动中阿文化交流务实合作,如举办大型国际书展、组织专业论坛等。2013~2023 年间,中国邀请沙特、阿联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作为贵宾国,携出版企业参加北京国际书

① 2024 年 3 月,该项目支持下的《考工记名物图解》阿拉伯语版由埃及斯福萨法出版社出版发行。

② 该项目于 2017 年开始运营,2018 年加入摩洛哥出版商协会,主要从事覆盖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等地区的图书出版、艺术展览和文化交流业务。同时,人民出版社还设立店社合一的星空书店,与摩洛哥“天舟书院”一体化运营,通过“合作出版”“分公司落地”“商业性文化艺术中心”三步走的战略,与阿联酋沙迦分社、澳新分支机构三位一体联动布局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市场。参见张立坤:《人民天舟:三步走布局摩洛哥市场》,载《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 年 4 月 14 日,第 7 版。

展。2024 年 1 月中国外文局中阿出版文化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双方出版机构协同创新机制建设迈入新阶段。同年,在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包括阿联酋沃塞莱出版社(Dar Al-Wasila)、黎巴嫩阿拉伯科学出版社(Dar Al-Kotob Al-Ilmiyyah)、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出版社(Hamad Bin Khalifa University Press)在内的数家著名阿拉伯出版机构与中阿出版文化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沙特出版商协会(Saudi Publishing Association)、沙特古索尔·达纳出版发行公司(Dar Jussor Dana)、沙特瓦尔卡出版发行公司(Dar Al Waraqa)签约加入中阿文化出版中心。中阿出版机构以国际化图书出版活动为平台和桥梁,推动出版机构间合作与技术赋能优化服务,致力于提升合作力度,促进资源整合与共享。

2. 中阿出版合作的提质升级

得益于中阿政府顶层设计的推动和中阿出版机构的协调合作,中阿出版合作进入了新时期。双方在出版内容、市场合作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相互依赖,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从中国市场看,各大出版社以“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为引领,将一系列阿拉伯经典文学作品译介到国内,出版多部阿拉伯文学作品,极大丰富了国内图书市场上阿拉伯文化产品的数量,为读者呈现了阿拉伯文学世界的独特魅力;从阿拉伯国家市场看,除“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出版书籍之外,双方还合作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文版、“中国对外传播译著”项目系列丛书,以及一批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总体涵盖政治、经济、文学等多领域图书种类。其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阿拉伯国家获得高度评价,被收录进埃及学校图书馆,“成为首部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的外国领导人著作”^①。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Essam Sharaf)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向国际社会分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有助于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中国现行政策,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际形象。^②

在技术合作方面,中阿出版交流合作已从单纯的图书翻译出版走向全方位、立体化融合发展,数字出版成为重要合作领域。阿拉伯国家积极探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出版,探索数字出版的新路径,包括加快电子书、有声书等数字化内容的转化与生产。如阿联酋阿布扎比书展“聚焦版权”项目,通过支持阿语图书内容的数字转化和资金投入,为中阿数字出版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阿拉伯出

① 张志文:《为促进中阿交流合作搭建桥梁》,载《人民日报》2023 年 5 月 29 日,第 15 版。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拉伯文版推介会在开罗举行》,新华网,2024 年 4 月 26 日, <https://www.news.cn/20240426/0d15acd429634d66908771672d019548/c.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版商协会秘书长巴沙尔·沙巴鲁(Bachar S. Chebaro)也希望中阿出版合作能够进一步开发数字出版、知识数据库、有声读物等新兴领域。^① 中方企业抓住这一趋势,积极参与阿拉伯国家出版数字化进程。以“that's books”数字阅读平台为例,尽管面临当地合作方数字出版思维和技术落后的挑战,五洲传播出版社依然凭借优势打造了当地内容资源最多、最新的数字阅读平台。通过与华为、阿拉伯国家出版商、阿拉伯电信运营商等合作,平台在电子书格式(即epub)加工标准、加工软件制作和员工培训等方面实现破局,不仅获得了大量优质阿拉伯语图书的电子版本发行权,而且其内容资源在阿拉伯电子书平台中处于领先水平。

在市场合作方面,中阿合力加强渠道拓展与品牌共建。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广泛关注和反响,合作市场潜力巨大。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治理模式以及现代化道路表现出强烈兴趣。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文版在阿拉伯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到2025年5月,第四卷已售出2.6万册。^② 《中国道路:奇迹和秘诀》《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等书籍也在阿拉伯国家出版发行,这些作品深刻阐释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智慧,为阿拉伯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的新视角。此外,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减贫经验和乡村振兴模式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如《善作善成:中国网络扶贫纪事》阿文版于2023年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发布;《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阿文版于2025年第39届突尼斯国际书展上发布;《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4):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书籍的阿文版已签约。为加快推动中阿出版市场合作,部分中国出版社进一步着眼于本土化发行网络建设,与阿拉伯出版社合作在阿拉伯国家成立分社,增强内容辐射力。^③ 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在阿联酋设立海外编辑部,朝华出版社与埃及希克迈特文化集团合作成立的海外编辑部,新世界出版社在埃及立中国图书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约旦阿克拉姆出版社合资成立的约旦分社等。这些分社或分支机构的设立,有助于中国出版机构更好地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利用当地的分销网络,将作品销售到更广泛区域,扩大作品的潜在读者群。

(二)“动员”:中阿出版合作可持续性维护

中阿出版合作实践机制的第四阶段围绕“动员”展开。作为文明交流互鉴实践机制可持续运转的长期保障,其目标是通过动态调整与制度优化,确保协作网

① 张志文:《以书为媒,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第15版。

② 张志文:《读懂新时代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载《人民日报》2025年5月7日,第15版。

③ 杨雪:《“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出版交流与合作》,第12页。

络在实践中保持活力与韧性。为此,需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化成果,在制度层面构建“刚性约束”与“柔性协调”相结合的保障体系,从而强化网络可靠性和有效性。在制度巩固和赋能优化的过程中,促使既有行动者继续参与合作网络并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旨在实现选题策划与内容创作、政策支持与合作机制、版权贸易与合作出版等方面的良性循环。

1. 中阿出版合作的制度巩固

随着中阿出版合作网络的日益扩大和逐渐稳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进一步以制度化形式巩固合作网络,并通过激励措施扩大既有成果。2022 年 12 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提出“八大共同行动”。其中,文明对话共同行动包含“同阿方共同实施百部典籍互译工程”,作为出版合作的示范工程持续落实。^① 2023 年,中阿出版合作交流论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双方达成“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识,提出构建“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并签署了沙特文学与出版翻译委员会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之间的执行计划。2024 年 5 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24 年至 2026 年行动执行计划》。文件强调,应在中阿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共识基础上,巩固中阿在各领域的合作,包括知识产权、人文交流、新闻出版等领域。其中,第十一条第十三款指出:“加强图书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实施中阿百部典籍互译工程,推动更多双方优秀图书互译出版。继续鼓励中阿出版机构互相参加对方国家国际书展。加强‘中阿文化出版中心’建设,打造中阿人文交流智库与出版人才库。”^②这一执行计划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出版业界加强交流、开展文明对话定下了基调,对面向未来的中阿出版合作和其他人文交流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阿拉伯国家也推出多种制度和机制来巩固中阿出版合作。一是在书展上设立多领域出版奖项,用于奖励在图书出版细分领域内作出贡献的出版机构和个人。如阿联酋的谢赫·扎耶德图书奖,在 2024 年将出版与技术奖颁给希克迈特文化—中国集团,肯定了该集团在“搭建一座讲述中国故事和历史的文化桥”方面的成就。此外还有沙迦国际图书奖、阿拉伯小说布克奖、沙特出版奖、卡塔尔阿拉伯小说奖等。二是制定相关政策对中阿出版合作进行政策扶持。如海合会

①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 年 12 月 9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10/content_5731138.htm,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5 日。

②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24 年至 2026 年行动执行计划》,中阿合作论坛,2024 年 6 月 6 日,http://www.chinaarabcf.org/lthyjwx/bzjhywj/dshijbzjhy/202406/t20240606_11381295.htm,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 日。

国家发布《2030 愿景》，加大对图书出版领域的政策支持及资金投入，推动出版业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沙特于 2020 年推出《数字经济政策》，在平台建设、内容数字化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明确提出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三是设立专项基金或提供经济支持，鼓励出版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如 2024 年 4 月，“中海人文交流和互鉴双语文库”建设工作启动，翻译出版在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具有重要影响、获得广泛认可的优秀图书。首批立项的 13 本中阿双语著作涵盖中阿文化的多个方面^①；阿联酋政府也为出版商和技术公司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出版商参加国际书展和文化交流活动。

2. 中阿出版合作的赋能优化

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出版合作紧紧围绕契合对方需要的优质内容、符合对方话语体系的精良翻译、及时有效的后续运营推广而展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特别是进入数智时代以来，出版的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内容创作和文化传播的大趋势，中阿出版合作正在实现从出版产品生产者向综合文化服务者转变，通过优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升整个网络的效能和协同能力。

一是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开辟多元化合作渠道。2023 年在沙特利雅得召开的中阿出版合作交流论坛上，双方一致约定，加快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成果落实，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建文明对话交流长效机制，共同实施中阿百部典籍互译工程，探索搭建中沙中阿网络出版交流机制。^②除了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机制（包括中阿新闻合作论坛和中阿图书馆与信息领域专家会议等）、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百千万”人文交流工程等多层次合作机制以外，中国的出版机构积极推进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与阿拉伯国家开展知识资源领域的共建共用，推动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交流、传播和创新发展。双方的合作涵盖了版权贸易、工程项目、图书展会、平台建设、多媒体营销等方式，展现了中阿出版交流合作的活力和创新。

二是搭建优质合作平台实现知识共享，利用数智技术赋能互译和出版创新。为应对全球数字化发展新趋势，中阿出版机构合作开发阿拉伯语电子书网站、阿拉伯语数字阅读平台、中阿版权贸易平台等，旨在实现中阿精品图书数字化落地。通过数据库与数字资源共享，搭建中阿文化交流数据库，整合双方的文化资源，包括古籍文献、学术资料、艺术作品等，进而实现数字化存储和在线共享。创新合作平台不仅推动了中阿文化交流与互鉴，还为中阿出版机构提供了合作机

^① 李潇：《“中海文库”走进阿联酋 文化桥梁连接中阿民心》，人民网，2024 年 10 月 11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1011/c1002-40336800.html>，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5 日。

^② 王海洲：《中阿出版合作交流论坛在沙特举办》。

会,促进了版权贸易的发展。近年来,中阿版权贸易量连续多年达到 2,000 项,占中国与世界各国版权贸易总量的 10%。^①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了中阿互译的质量与效率。目前,阿拉伯语大模型的开发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相关产品极为稀缺,但应用潜力巨大。2023 年,华为在中东、北非地区推出了本地云和阿语大模型服务,构建符合本地需求的智慧底座。^② 2024 年 5 月,华为云在埃及发布业界首个千亿参数的标准阿拉伯语大模型,该模型集合了全球最大的阿语语料库,提供准确的阿语理解和对话能力,未来应用场景十分广阔。^③ 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运用,技术赋能经典互译和出版合作是必然趋势,中阿出版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将不断增加。

三、中阿出版合作的挑战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上述中阿出版合作实践机制的四个阶段,循环维护需建立评估—反馈—升级机制。通过定期评估合作项目的成果绩效,识别网络运行中的短板与不足,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或者项目的落实与改进。只有认清中阿出版合作面临的挑战,根据双方出版合作的可持续性与发展提出优化建议,才能兼顾网络动态性和网络稳定性,从而优化中阿出版合作中的资源配置并提升其在双方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实践效果。

(一) 中阿出版合作面临的挑战

首先,在市场层面,中阿图书市场需求低迷,本土化运营不足,政策法规受限,商业可持续运作受到挑战。有学者指出,中阿典籍互译旨在及时弥补出版合作机制的不足^④。但自“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启动至今已有十余年,双方政府尽管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维持项目的持续推进,市场给出的答案却不甚乐观,译介

① 《中国图书在利雅得国际书展备受关注——以书为媒,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新闻出版署,2023 年 10 月 11 日,https://www.nppa.gov.cn/xxfb/ywdt/202310/t20231011_773856.html,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5 日。

②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4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file.huawei.com/minisite/media/annual_report/annual_report_2023_cn.pdf,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5 日。

③ 《华为云埃及正式开服,成为北部非洲第一朵公有云》,华为云,2024 年 5 月 22 日,<https://www.huaweicloud.com/news/2024/20240522173651457.html>,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25 日。

④ 林丰民:《中阿典籍互译的启示:文化交流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中国作家网,2023 年 6 月 21 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621/c431803-40018692.html>,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5 日。

图书在中国国内市场表现一般。以国内最主要的图书评价平台“豆瓣”为例,进入“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界面,总共 26 本图书中,绝大多数图书少于 10 人次进行评价,仅有《悬诗》《日落绿洲》《格拉纳达三部曲》评价较高,但评价人数也仅有 30~40 人次。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纳吉布·迈哈福兹《两宫间》《始与末》《怡心园》等经典著作尽管评分较高,但评价人数均未超过 200 人次。^① 相比之下,同期出版的其他国家文学作品,其推广力度和市场反响让阿拉伯文学作品难以望其项背。尽管并非所有引进译著都能取得市场和口碑的双成功,但阿拉伯文学在国内图书市场的普遍遇冷,反映出这一合作机制在商业运营方面尚有提升空间。与此同时,中国译介到阿拉伯国家市场的图书也遭到冷遇。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阿拉伯社会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兴趣显著增加,中国各代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陆续译成阿拉伯文,但许多著名中国作家的名字在阿拉伯语阅读圈中仍然默默无闻。阿拉比出版社(Al Arabi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ng)社长沙里夫·巴克爾(Sherif Bakr)指出,尽管其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给予重视,但其市场表现仍然不及日韩等国的文学作品。^② 特别是有些作品内容涉及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这些作品的传播,尽管在客观上对于阿拉伯国家民众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有一定帮助,但无疑会对中国形象产生认知偏差。^③

市场层面出现问题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的直接原因是出版选题与市场脱节。如对部分国家的出版政策、出版现状以及译介出版需求缺乏系统了解和研究,^④ 导致部分翻译项目追求数量或受到政策导向影响而忽视市场需求,相关译作难以进入主流发行渠道。有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外宣图书,较难满足阿拉伯读者对于了解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的需求,或者因其内容高度本土化而令阿拉伯读者难以共情和理解。同时,国内引进的阿拉伯作品目前多集中于文学领域,缺乏社会科学研究等深度内容。这同样无助于满足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明的认识需要。在议题生成和需求对接阶段,由于部分翻译项目受政

① 相关数据参见《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豆瓣读书,<https://book.douban.com/series/26572?page=1&order=time>,上网时间:2025 年 2 月 26 日。

② 《为什么中国文学在阿拉伯世界仍然不受待见》(阿拉伯文),*Independent Arabic*, 2022 年 4 月 14 日,<https://www.independentarabia.com/node/321051/>“ثقافة/لماذا لا يهزج-الأدب-الصيني-غير-رائج-عربياً؟”,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7 日。

③ 《阿拉伯人对中国现代文学了解多少? 一片可供深入探索的原始森林》(阿拉伯文),*Al-Jarida*, 2007 年 8 月 28 日,<https://www.aljarida.com/articles/1461348119046638600>,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7 日。

④ 张洪波:《加强“一带一路”版权合作,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一带一路”网,2019 年 12 月 13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112643.html>,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1 日。

策导向和成果数量要求而仓促开展,导致合作初期难以形成足够的正向反馈和利益联结。这种市场低迷的现状在后续网络强化阶段不断凸显。合作网络本应通过签订长期协议,资源、利益共享以及共建平台来实现绑定效应,但由于双方的译介作品在市场上的反响平平,各参与方的收益较低,持续参与的激励不足,导致退出成本偏低,合作稳定性因此受到挑战。

其次,在技术层面,数字鸿沟制约出版数字化转型与传播。数字出版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以数字空间和网络平台为载体,是在工作流程、任务组织、内容审核、管理以及产品形态上实现数字化的产业活动。^① 它必须依托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高的社会数字化程度来进行。一方面,中东地区数字化发展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普及程度高度不均。根据世界银行 2023 年数据,西亚北非地区整体互联网渗透率为 77%,但内部分化明显,海合会国家的互联网覆盖率与数字化程度普遍较高;长期处于战乱或发展程度较低的阿拉伯国家,其互联网使用率和移动网络覆盖率均较为低下,不同区域的数字市场也相对独立。^② 这种发展不均衡导致中国出版机构难以构建统一的数字化传播平台,从而高效触及广阔的阿拉伯国家出版市场。

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年轻人口占比较高,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年轻群体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电子书平台等数字移动方式接收和获取信息,在阅读中更倾向于“短平快”模式,因此传统纸质出版物的销量受到冲击。目前,中阿出版机构合作多聚焦实体书发行,在数字版权合作和平台共建方面进展缓慢且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在线阅读需要。推进出版合作的发展鸿沟和技术障碍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技术鸿沟在网络强化阶段直接阻碍了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的可能。缺乏完善的数字平台和伴生的数字化出版合作机制,使得双方在进行版权合作、线上推广以及数字内容生产时,缺乏支持“底座”,难以形成有规模、可持续的数字渠道合作。

如果说技术问题已经成为网络强化和韧性维护阶段中影响中阿出版合作网络稳固和长效运营的关键瓶颈之一,那么,出版标准的不一致使得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尽管在一些技术领域,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参考国际标准,如在电子出版物中采用国际通用的数字出版标准,但阿拉伯各国的出版政策法规仍有差别。普遍而言,出版活动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各国均设有独立的媒体监管机

① Jacob Cherian, “Emergence of Digital Publishing: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Print Publications,”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23, No. 1, 2015, pp. 576–586.

② World Bank Group, *Digital Progress and Trends Report 2023*, https://bit.ly/Digital_Progress_and_Trends_Report_2023,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1 日。

构,负责审核和监管媒体机构的运营和内容。具体而言,除了在维护宗教信仰、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方面一致以外,埃及出版物须符合埃及的强制性标准,如涉及安全、质量等方面;阿联酋的出版政策法规旨在平衡媒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同时推动出版行业的创新和发展;沙特的出版许可条件包括申请者的年龄、资质和道德品质。鉴于此,国际出版商需确保内容符合阿拉伯国家宗教和文化规范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各国差异,避免因内容问题导致出版物被禁。

最后,在内容层面,文化理解不足和语言差异导致中阿出版合作在选题策划与内容创作方面缺乏针对性,局限于传统的、具有历史色彩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目标市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随着国际传播能力日益深刻影响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它已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①而文化有效传播的关键是相互联系和认同感的形成,以及伴生而来受众集体需求的产生,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叙事”作为基底实现连接。一些阿拉伯出版机构在策划中国主题的图书选题时,往往只停留在对中国标志性元素(长城、熊猫、中国功夫等)的表面认知上,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其他深刻内涵,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代科技发展等具有更系统性和时代性的题材。与此同时,中国读者对阿拉伯当代社会的认知容易受到西方媒体对阿拉伯世界片面描绘的影响,多停留在“石油经济”“战乱冲突”等表层标签,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等议题了解有限,且因缺乏共同的意义情境而难以引发共鸣。虽然在议题生成和需求对接阶段,双方可能通过示范性项目选择低敏感领域来逐步积累信任,但文化差异成为后续网络强化阶段扩大出版规模的阻碍。它不仅影响了合作网络的制度化构建,还使得在国际传播和品牌塑造过程中形成“文化折扣”,双方难以形成在对方社会中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文化叙事。

在内容创作方面缺乏文化深度融合已成为制约中阿出版合作的主要因素。一是不少以中阿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作品,只是简单罗列中阿文化各自的特色,缺乏深入探讨两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内容,较少关注动态过程与网络的演变。由于内容不能很好地顺应双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期待,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二是当今中阿在贸易、能源、航天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出版内容创作没有及时跟上。如在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尽管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多个太空探索合作项目,但相关的科普图书、纪实文学等作品却很少,难以满足读者对于深入了解这种前沿合作的渴望。鉴于此,出版合作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行动者网络,核心行动者只有将创作目标问题化,通过市场调研发

^① 李娟:《自我与他者:国际传播认识论的内在理路》,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12期,第56页。

现某一题材的潜在需求,使其成为其他行动者关注的焦点,才能确保各行动者维持后续的有效协作,从而维持创作网络的稳定运行。

(二) 中阿出版合作的优化路径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出版合作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翻译出版、学术传播、数字平台建设等多种形式,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展望未来,中阿双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优化出版合作路径和机制。

首先,夯实多元行动者的协同作用,深化互利共赢模式。出版合作的内容创作不应仅仅关注人类创作者,而是应重视核心行动者和关键行动者的协同作用。通过优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提高内容创作的质量和效率。如中阿出版合作在市场推广和政策沟通方面,亟需从顶层设计出发,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同互动,深入了解阿拉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模、增长趋势、消费习惯、政策法规等,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拓展策略。现有的出版互译工程在市场层面上难以满足各方读者的实际需求,译作在国内外主流发行渠道中表现低迷。这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出版合作的战略定位,明确合作目标与路径,建立一套既具有政策导向性又符合市场规律的运行机制。^① 在顶层设计中,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与出版机构主动传播的双重优势,统筹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扶持措施和版权保护机制,鼓励通过“文化企业合作”“融媒体宣传”“海外版权代理人”等模式,实现出版项目的本土化运作。^② 如借鉴黎巴嫩雪松出版社在海外版权输出上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邀请阿拉伯本土专家、学者和翻译人才参与选题策划与内容本土化改编,既能提高译作在当地市场的适应性,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优秀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树立良好形象。通过持续的政策沟通和项目深耕,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够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中阿出版合作注入长效发展动力。

其次,塑造新技术驱动的出版生态,推动出版合作提质升级。在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融合领域,技术平台和创作工具(在线写作平台、排版软件、多媒体编辑工具等)成为出版合作内容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些工具不仅提高了创作效率,还改变了创作方式和内容呈现形式。中阿出版合作面临着传统纸质出版模式与数字阅读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需要利用在线平台进行国际出版合作,拓展市场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实现更广泛的传播与交流。双方出版机构应紧跟数字

^① 杨丽萍:《以文化自信助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策略研究》,载《新楚文化》2023 年第 22 期,第 65 页。

^② 王松茂:《我国出版业海外投资中的问题研究》,载《出版科学》2014 年第 5 期,第 68 页。

经济的发展步伐,借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有力契机,推动数字出版平台的共建与互联互通。中宣部 2022 年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及 2023 年《“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为国际出版合作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力,促使中国出版界积极参与到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共同研发适合当地市场的数字内容产品。在阿联酋、沙特等海合会国家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合作搭建集成化数字出版平台,不仅能够打通中阿出版合作中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还可利用数字平台实现线上和线下渠道的无缝对接,提升整体出版传播效率,进而激发双方在数字出版贸易中的新动能,推动出版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①

最后,构建稳定高效的内容创作网络,实现从项目运作向体系建设的根本性转变。内容创作是推动出版产业发展的核心环节,它不仅涉及创意生成与文本撰写,更需要在跨文化语境下进行精准定位和多元呈现,以适应不同市场和读者的需求。中阿双方应重视跨文化内容创作的动态优化,充分认识并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努力构建不同社会和文化间对话与共鸣的有效机制。为此,可以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重整外宣流程,从根本上解决“传而不通”的问题。^② 一是以“人才为本+内容为王+技术赋能”为原则,培养了解双方文化内涵的高水平跨文化交流翻译人才,在翻译和编纂过程中注重本土化处理,既保留原有文化的独特韵味,又适应目标市场的阅读习惯和情感表达。高质量内容的生产同时也可以加速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数据集训练,推动相关技术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并藉此反哺语言互译以及更广泛层面上跨文化交流的可及性、准确性与高效性;二是积极借助国际书展、学术论坛、文学交流等多种形式,推动中阿文化深度对接与互鉴,利用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和在地桥接群体的力量,从“他塑”角度精准传递中国故事。通过邀请阿拉伯国家的知名汉学家、文化专家参与中国叙事构建,不断完善中阿出版合作的国际传播机制,形成一种既尊重双方文化多元性,又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协同模式;三是注重拓宽合作领域,打破传统的对外宣传模式,采用“多元话语体系”构建国际公共议题,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宗教信仰和行为模式,进而促进跨文化交流并提升社会包容性。通过不断深化双向交流与合作,构建一个涵盖多个方面、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中阿出版合作框架,进而推动双方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持续发展。

① 王大可、何雪琪、李本乾:《出版走出去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进展、挑战与实践路径》,载《中国编辑》2024 年第 1 期,第 67 页。

② 甄云霞:《“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载《出版发行研究》2022 年第 11 期,第 85 页。

四、结语

新时代的中阿出版合作正在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也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更多的精神资源,亦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的“平等包容、互学互鉴”提供了具象化范本。中阿出版交流与合作在助推文化理解与认同,促进知识传播与共享,确保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现已成为双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样例。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模型为工具,通过“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四个子阶段的机制实践,分析中阿出版合作的“动能生成”和“网络强化”,在探讨中阿出版合作动因、机制、挑战及其优化路径的同时,也关注到中阿出版合作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合作关系。截至目前,中阿出版合作已经探索出一条成效斐然、发展潜力巨大的道路,但依然面临市场动能不足、数字化转型受阻、文化传播力较弱等长期性挑战。通过重视多元行动者的协同作用、加快数字化转型与技术融合、构建稳定且高效的内容创作网络,中阿出版合作将不断落实本土下沉、探索数字转向、优化产业全链和布局,共同推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

总之,中阿出版交流与合作立足于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与人文价值观念,依托中阿合作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不断激活了两大文明相知相交、合作共赢的共同记忆。特别是 2022 年首届中阿峰会召开以来,双方不断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本着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文明对话交流长效机制等宗旨,中阿双方在互译出版、版权贸易、书展平台、网络出版等方面持续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双边和多边交流合作。展望未来,中阿双方将顺应大势,服务大局,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明晰彼此的需求和要求,努力开展双向合作,切实升级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国际出版合作机制,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机制提供参考与借鉴。

(责任编辑:章 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

30 Practical Mechanism of Publish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Abstract The publish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is a key area for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undertaking the important task of achieving two-way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value co-creation.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multiple paths such as government-led and market-driven mechanisms,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cross-cultural strategy optimization, the two sides have achieved many remarkable results.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model in Actor-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China-Arab publishing cooperation by adopting the four-stage mechanism of “problematization”, “interessement”, “enrollment”, and “mobilization” involved in momentum generation and network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ina-Arab publishing cooperation bears profou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t fosters cultural identity, enriches the very fabric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and amplifies global discourse power, thereby laying a robust theoretical groundwork for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Arab nations. However, persistent challenges remain: publishing topics often disconnect from market deman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ces constraints,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gaps coupled with language barriers persist. The two sid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ynergistic role of multiple subjects, promote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publishing platforms, and build a stable and efficient creative network, so as to achieve two-way improvement in the contents and mechanisms of China-Arab publishing cooperation.

Key Word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Practical Mechanism; Actor-Network Theory; China-Arab Publishing Cooperation

Authors LI Yi, Ph. D., Associate Senior Edit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ZHENG Zhaochen,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and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3 China-Arab Cooperation in the Discourse of Maghreb Countries’ Mainstream Media

Abstract Strategically situated at the tri-continental junction of Asia, Africa, and Europe, the Maghreb region holds significant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as a pivotal platform for advancing China-Arab and China-Africa rela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mainstream media coverage of China-Arab cooperation across five Maghreb nations (2018 – 2024) through quantitative volume analysis, reporting tendency assessment, thematic deconstruction, and